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六年第三期 总第13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01 重点推介

01 重建激励适度分享 宏观政策新视角

02 中国理念在 G20 绽放

04 中国将扮演好大国角色

06 聚焦中三角

06 赣黔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06 湖北灿烂历史 三国文化活现

07 改革探索

07 中国经济在两难中求改革

11 法人治理全员聘用 全面预约打包收费“香港模式”助力深圳医改

12 经济广角

12 今年有望实现经济增长 6.7%左右

13 下半年财政政策空间较大 减税空间仍然存在

18 长江经济带发展设目标 重点布局三大城市群

20 中国将构建电商标准体系

20 科教文卫

20 华语片“走出去”须重视海外市场

21 中国首制细胞治疗应用国际标准

22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22 中国新农人涌现成为打造现代农业新引擎

23 “光伏+”扶贫模式可持续吗？

26 社会观察

26 大城市人口调节要均衡不要平均

29 中产阶级崛起的喜与忧

30 综合治理

30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32 实名制顾此失彼

33 环球视野

33 全球化治理面临挑战

35 《两岸和平协议》首次写入国民党政纲

36 学术前沿

36 解读《“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38 解读《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41 讯息快递

孝感图书馆

重建激励适度分享 宏观政策新视角

香港《大公报》2016年8月25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后的“慢下来”，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困局。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经济从来就在争议、争论中蹒跚前行，但从未有今天这般中央高层各说各话的“冷交锋”。这场经济路线之争，在特定的政经背景下，会否演化为政治路线之争，对即将到来的2017“大事之年”，影响重大。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核心在于如何重建激励相容和适度分享机制。政府完全可结合中国式的杠杆乾坤大挪移，把现有局部企业、地方政府，传统行业的高杠杆转移到更具活力的居民部门、新兴产业和直接融资金融体系，来提升经济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

从分享角度看，中国并非没有需求，任何有效需求都是需要购买力作为支持的。例如现在迁徙儿童和留守儿童接近一亿，除非得到包括教育、医疗、健康在内的充分公共服务的支持，未来他们才会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不是相反。现在减少一元钱的投入，未来用来纠正的成本可能要十倍。

加大公共服务投入

实际上近期一些关于教育、医疗、治安等方面的社会热点事件，既是痛点和大众关切，也明确的指出了未来改进的方向。这绝非是简单的福利国家政策堆积。众多研究有力的证明，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形成贫困的重要原因，而这些方面的有效投资会极大的促进长期生产边界的扩大，也正是以需求侧结构性刺激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政策体现。

鉴于目前众多托底政策呈现出的碎片化特征，笔者建议设立一只10万亿量级的“补短板基金”（或者叫“公共服务均等化基金”），主要为未来数年可以落户城市的一亿农民工（及随迁子女）提供公共服务，投向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兼顾公共住房、旧城改造等。这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分享，通过对于教育、公共服务的投资，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需求。

在此基调上，政府还可全力推进深度城市化，通过放松土地管控，加快土地改革，放松户籍管制，进行超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建设。通过长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建设实践建立起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采用最新的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软硬件系统，加大居住容积率，强化副都心建设力度，吸收更多人口落户核心城市群。

政府也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产业重新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从而破解传统模式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部分缺失。同时从供给端压制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明确未来房产税的本质是基于存量财富重估的具有累进性质的资本利得税，以调节财富分配失衡，并为未来城市运营管理新增可持续的财力来源。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从激励机制来看，老乡、公务员、外资和民资都很重要，应当全面更新激励机制，让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企业家、政府官员、创业者、农民工、外资都要肯干才能成事。只有唤醒各要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让财富源泉充分奔涌出来。因此要明确政策，稳定预期，坚定市场信心，特别是民间资本的信心。

这就要求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广义）树立一些标杆，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在新预算管理和债务约束的情况下，传统 GDP 锦标赛下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将被抑制，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基建投资，即所谓的 PPP 模式（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也成为必然的选择。比如目前正在开展的政府引导基金，由政府出资，吸引有关地方政府、金融、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不以营利为目的，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投资于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或新设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PPP 模式不仅是用于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困境，关键在于改进治理机制，强化民资信心，提升投资效率，激发经济自身动力。另一方面，要培育良好的全方位的创新生态环境，通过保护产权、创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环境，以此来鼓励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发挥创新精神，在平等开放，相互支持的环境下建立良性循环的新政商关系。在上述激励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要切忌行政体系内以文件落实文件，科学研究以模型推导模型，而金融市场以忽悠刺激忽悠。

中国理念在G20绽放

宋哲 香港《星岛日报》2016年8月30日

第十一届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近期将在美丽的历史名城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活动，集主场外交、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于一体，备受国内外关注。这是中国首次举办 G20 峰会。浓淡相宜的西湖、焕然一新的社区、整洁畅通的街道、全民参与的气氛，令杭州峰会带上很深的中国印记。但这只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举办峰会为世界带来了甚么理念，贡献了甚么智慧，提出了甚么方案？会议还没开，但我们从本届峰会的主题、议题及筹备过程，已可看出端倪。

天涯若比邻 难独善其身

一看中国的世界观。当前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资讯化深入发展，令世界处于大变动、大调整中。中国始终认为，现代化令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昔日的天涯海角已变成左邻右舍。当今世界的任何问题并非某个国家自己的问题，只靠一国也无法单独应对。这也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 G20 成立的初衷。G20 成员都是世界重要经济体。在经济、贸易、金融高度联动的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迎接挑战、出谋划策。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彰显了中国愿与各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与担当。

二看中国的发展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当前世界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部分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突出，这与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仍在发展、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遇到瓶颈密切相关。近年来，一些国家政府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或量宽政策，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经济资料，却未能治本。“智者顺时而谋”。要适应国际经济“新常态”，必须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品质和效益为中心，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激发市场活力。中国政府“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用”的发展理念，其核心就是通过加大创新力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竞争力。本届 G20 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正是中国发展理念在世界的延伸，也是中国对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困境做出贡献的方案。

三看中国的合作观。无论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还是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中国都倡导要合作、不要对抗，要与邻为善、不要以邻为壑。我们主张，合作要平等相待。在 G20 中，不管是经济总量超过十万亿美元的中国和美国，还是成熟发达经济体，或是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合作的平等伙伴。大家有话好好说，有事一起办。合作要和谐包容，各国国情和发展道路不同，但在共谋发展中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与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合作要互利共赢。现代科技发展令世界变“小”了，我们却要把共同发展的蛋糕做“大”，让更多的人受惠，而不是转嫁矛盾、损人利己。

四看中国的价值观。中国是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优秀的中华文化对解决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借鉴。比如我们近年来提出“正确义利观”，这对国际关系、对全球经济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不应恃强凌弱、嫌贫爱富，而是应该义利兼顾，必要时舍利取义。本次 G20 峰会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画主席国塞内加尔、七十七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参加，使本次峰会成为 G20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最强的一次。这体现了中国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定位。

中国将扮演好大国角色

程亚文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年9月15日

1978年，瑞典汉学家贡纳尔·雅林时隔半世纪后再次访华，在前往北京的航班上，一位西德商人曾向他提问：“有多少人知道，如果中国人这个梦想成为现实，对整个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正在对此给出新的注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工业化国家，是将还像以往那样专注于自身发展，“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还是要为世界共同的发展和更安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做出中国的独特贡献？G20会议前的一系列预热，所表明的是后一点。

早在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就郑重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去年底以来，中国围绕G20峰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从政府到民间，从政策表达到学术交流，中国对内对外都进行了充分沟通，良好阐述了中国对G20峰会的构想和愿景。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不再把G20峰会仅仅作为专注于某一类全球性问题的会议机制，而是把它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来看待，相信通过这次峰会，G20机制将由以往重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制度安排，转变为一种协调全球共同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中国在通过G20机制推进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再以消极、被动的角色出现，而是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鲜明提出中国方案、展示中国路径，扮演起负责任大国的引领作用。

有人认为，这次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G20峰会，是中国以全新面貌向国际社会的回归，象征着世界大同理想在中国的再次复兴。良哉斯言！最近几年来的中国外交，高度重视国际社会的“共同体”建设，认为人类共在一个地球，共享一种命运。它也正在迎来不少正面回应，在G20峰会召开前夕，加拿大宣布正式申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无疑是对中国介入全球治理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面貌提出“中国方案”、介入全球治理，还显示中国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世界，都正在探索一种新的文明高度。对这一点，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们或者以中国人均产值“比人家还差一大截”为由，或者用中国频繁的矿难、不绝的土地纠纷、大量的官员腐败作证，提出中国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或者哪有资格去“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人普遍还深受二三十年前形成的思维方式所支配，“先进的西方 vs 落后的中

国”是其主要内涵。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好比一个只管闷头赶路、无暇顾及其他的跑步者，现在不知不觉已跑到很多人的前面，然而自己还以为远落人后，心中充满了惶恐和不自信。

然而，就像国际社会对这次 G20 峰会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期待那样，世界业已把目光转向中国。创造“中国价值”、走出“中国道路”、形成“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中国自己要还是不要的问题，而是世界对中国已产生的新愿景，许多国家希望中国能为人类前途树立起新标杆。

中国今天其实已经不再欠缺物质基础。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在经济上走出了“中国速度”，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到相对富裕的转变；总结过去，在此基础上再出发，塑造“中国高度”、开拓文明新格局，已极为必要。从古到今，“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种文明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经历近百余年来的艰辛曲折，又到了这样的时刻，中国要从自身文明以及人类文明的高度来打量自身。

“中国”是中国的，命中注定也是世界的，这是中国绕不开的天命。无论当下的中国人认识到没有和赞同与否，自 2008 年西方爆发金融和债务危机，产于欧美的“现代性方案”或制度、知识体系遭遇重大挫折以来，中国以一个领导型国家的面貌，进一步走进全球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中心地带，已经无可回避。那个只顾自身经济发展的中国，已经不适应世界，也不宜于自己。

中国已在各个层面，向人类文明的高地进发，但从整体来说，中国还没有建构起应有的文明高度。在初步达成小康目标后，中国往后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该实现什么样的、更好的内部治理？又要不要，以及如何参与世界治理？在知识体系与制度创新上，该为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中国需要清楚认识到：近五百年来的西方化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在西方知识体系及制度框架内，已经无法处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各种国别性或全球性问题了。

一个旧的世界行将过去，一个新的世界有待打开。世界现在是在看着中国，“中国责任论”不简单是要中国出钱出力，而是要中国一起去为化解世界问题出点子、想办法，是要中国与其他有能力的国家一道，也扮演起领导性角色。这并不是去排斥取代美国和西方，而是要与其他国家一起，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经验教训，推动创造一种有别于当代西方文明的文明形式，产生新的国际制度安排和世界治理模式。

这个新的文明，将既非当前所见的西方文明，又非中国古典文明的重现，而是揉和了一切文明成就，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一种文明类型。不站到自身文明和全球文明的高度，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赣黔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王道 周亚明 香港《大公报》2016年8月24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福建、江西和贵州三省作为生态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被纳入首批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探索形成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

据悉，2014年11月，江西列入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一年多来，江西省围绕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要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位居全国前列。

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李作勋表示，2014年6月初，贵州启动了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李作勋说，由部委所批的“示范区”，上升到中办、国办选定的首批“试验区”，主题更加突出，更加集中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体制改革方面，希望试验区尽快形成若干可操作、有效管用、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

湖北灿烂历史 三国文化活现

杨之中 台湾《真晨报》2016年8月28日

中国共产党正采取行动收紧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逆转了按照西方企业的模式重塑这些企业的近20年尝试。

第十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第三天展开“襄阳三国文化”之旅。湖北省台办副主任涂阳斌指出：湖北有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其中三国文化是两岸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记忆。

他说明：襄阳古城距今2800多年，始终保存完好。襄阳是“中国三国文化之乡”，“三国演义”120回中，有32回发生在襄阳，包括：携民渡江、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故事。

襄阳古隆中是三国文化的发源地，诸葛亮在襄阳生活了14年，在古隆中躬耕10年，著名的“三顾茅庐”和“隆中对”就发生在古隆中，诸葛亮也是在此思定三分天下大策。

涂阳斌强调：要想读懂三国，就要从了解襄阳开始。

襄阳城位于汉水中游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并有全国最宽的护城河，自古

即为军事要地，易守难攻，固若金汤。

记者昨天参访，见证了“城高池深”的记载，令人赞誉。

经查问襄阳城护城河的宽度，导游说是在130到250米之间，平均宽度在180米左右。比起北京、开封、洛阳等城的护城河，都还要宽，所以历来屡屡发挥御敌、防洪等功效。

襄阳城约始筑于西汉高帝六年，到三国时期刘表作荆州牧开始，襄阳就成州、郡、府、县的政军中心。

旧襄阳城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城垣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傍山，形势险要，整座城略呈方形，面积约2.5平方公里。城墙高约8.5米，宽5到15米，墙体用土夯筑，外砌城砖，气势雄伟，堪称襄阳胜景。

现代人们记忆最深的，莫过于1935年7月7日的洪灾，当时沿汉水两岸的城镇、村庄，均被淹没，唯独襄阳城内未有进水，这全靠襄阳城防水性能良好的缘故，其中护城河发挥很大的防洪作用。

改革探索

中国经济在两难中求改革

左仲生 香港《广角镜》2016年8月16日

中国经济面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和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当局不刺激不行，不刺激不仅会形成更大的失业压力，而是将暴露更大的风险，经济与社会难以稳住。但是过度刺激也不行，因刺激效应在明显递减，刺激空间在缩小，过度刺激只能给未来埋下更大的隐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说，这正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两难选择。目前的两难比较上世纪90年代末曾经的经济调整压力，从时间换空间角度看，现在是时间更加不等人越来越紧迫，因此到了必须痛下狠心，忍受重痛作出战略性选择的时候。

两难契机守底促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的调整转型正处于痛苦关键的时期。其趋势性特征表现为，一是结构调整与转型已出现好的苗子与势头。这不管是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结构、利润结构的分化，还是从单位能耗、就业分布以及CPI等动态指针看都可得到证明。二是在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中，新动能对增长的动力还难以抵消旧动能对增长下行的下坠力。虽然近两年以互联网、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显著，但由于其规模体量较小，仍不足以对冲受国内外经济复苏缓慢因素影响的过

剩传统制造业大幅下行的牵制。三是整体经济仍存在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下半年GDP增速会进一步下行，不排除四季度可能跌破6.5%，何时见底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状况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动态协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因此处在调整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2011年以来出于经济下行压力和稳增长的需要，我国持续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投放了大量的货币。随着经济下行和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必然会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有关舆论认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宁愿居安思危，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

分析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已不能仅仅沿袭过去银企之间简单的，仅仅限于借贷双方的债权债务分析关系，因为现在从社会资金转为企业资金的来源，一是银行贷款，二是股票债券，三是形式多样的各类非银行金融资产，例如银行理财、证券公司专户理财、信托资金、P2P、保险资金运用等。目前一些银行为了降低成本、降低存贷比、降低风险资产规模，纷纷绕过监管，通过同业往来、应收账款、持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的金融产品等各种方式，大幅增加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表现为第三类非银行金融资产。在此类资产交易中，企业想得到一笔负债，往往是通过它们在市场上设计出复杂的交易结构，涉及多方机构，额外增加了很多交易环节，通过放大未列入官方统计的信用规模而得以完成。

这一系列交易环节恰恰是当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链上的薄弱点和导火索，也是创新活跃、监管滞后时，不易被传统风险分析所关注的环节。如果目前整顿策略简单想立刻堵塞各种风险漏洞，很有可能出现去年股灾前去杠杆时发生的市场动荡和倒塌事件。今年前五个月已有三十多家企业包括大型央企频频发生债券违约事件，当市场传出债市要整顿的舆论时，有一些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券马上发不出去。

对于系统性风险问题，中国当前确实不会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但是从债务链的险情看，中国已经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之所以未爆发，一是因为中国已采取了别国危机后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大量的货币投放确保了银行不会发生挤兑问题。二是各种行政干预不允许银行逼债抽贷，不允许企业破产，这样才防止了债务链的风险传递。如果坚持严肃的市场法治，有一批企业马上会倒闭破产并引起连锁反应。如果不能真正加快改革，那么温水煮青蛙暂时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但同样会把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财富慢慢侵蚀。

面对两难根本出路在改革，守住底线改革为先。改革有可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速和加快暴露风险，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但是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毫无出路。那么在改革的力度、措施的选择、措施出台时机的把握上，必须以守住两条底线为原则。一是在三去中要容忍逐步释放一些风险，但是绝不能去主动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在

改革与转型中尽量安置好下岗失业人员，但是绝不能出现大面积社会不能容忍的失业局面。只要守住这两条，紧紧咬住改革不放松，以改革为先，中长期就会有希望，短期内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应不必在乎。

承认损失，统筹安排。面对经济由过去长期超级繁荣转向常态健康发展中所暴露的存量风险，这是已发生的损失必须承认，必须有人买单。如果迟迟不买单，不剥离风险，不处理僵尸企业，不减记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社会资源包括资金将长期得不到合理配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解决三去问题不能仅靠统一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债权债务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资金统筹解决的安排，因为目前还缺少有效的任凭市场调节的机制。为此，对在三去中形成的损失（企业欠债和银行坏账），必须尽快研究制定统筹解决的方案。倒逼改革抓住重点，改革工作千头万绪，要学会弹钢琴，当前更应强调问题导向，重点是紧紧咬住经济转型中的主要困难和障碍决不松手。

维持消费增长是最大挑战

二季度中国出现了两个反差极大的投资资料，一是基建投资高速增长，二是民营投资大幅下降，有关舆论认为将会使经济进一步下行而引起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报道称，不必为中国经济平缓下行而悲观。中国的发展路径很大程度是通过高投资促进经济高增长。民营经济对投资回报率的敏感度要高于国有投资，它的快速下滑正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在不断恶化。

投资增速下行和经济增速下降引发了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今年以来国务院相关部门对民营经济投资增速下降进行了很多调研，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出台政策鼓励民营经济投资。刺激还是不刺激在学术界也引发了宏观政策的激烈争论。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没有低于潜在增速，即便PPI经历了较长期的负增长，中国政府不需要更强的投资刺激计划。如果继续加大投资力度，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但是资本产出比也会不断提高，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会不断恶化，更糟糕的是扩大投资之后会面临更大的需求不足，因为新增产能更大了，需要更大的投资力度来充分消化这些产能。

如果不推行更大的投资刺激计划，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中国经济会陷入某种程度的危机吗？笔者认为，一个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经济才是真正富裕的经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会像工业这么快，在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中国不需要新一轮的投资刺激计划，而是需要新一轮的结构改革。如果把观察中国经济是否健康的指标从经济增速转向就业和居民福利，就不会对投资和经济增速下滑产生这么多忧虑。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在较长时期增速平缓下行，但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居民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中国经济。它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它既不特别让人振奋，但也根本不必悲观，这些都是自然的发展过程。

外界舆论普遍认为，英国脱欧将对世界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又如何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杜大伟认为，英国脱欧本身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它却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他说，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并无太大直接影响，尽管它的确加大了金融动荡的风险，但长远来看，脱欧对中国有利无弊，西方持续衰落而中国继续崛起。

英国脱欧公投后，全球股市震荡。有趣的是中国是个例外，沪市仅下跌1%，而下一个交易日即恢复如常，甚至略有上涨。短期来看，英国脱欧会带来一定副作用，因为欧洲生产总值和贸易增长变缓，而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高，全球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基本为零。中国最初通过大量项目鼓励投资，以弥补外需不足，这导致目前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产能过剩，其结果便是投资增长变缓，但中国GDP增长仍然坚挺，因为消费成为了目前需求的主要来源，它对GDP增长的贡献持续稳定在4%以上，并呈上升趋势。

中国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工资增长处于健康水平，消费上涨，服务业规模也因此扩大。

由于服务业相对工业来说是更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此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保持了劳动力市场紧俏。对中国来说，维持消费是最大的挑战而非外部市场。中国新增长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国内投资机会变少，资本出现稳定外流。英国曾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理想目的地之一，并被视为通往欧洲市场的跳板。中国公司现在需要重新考虑这一策略，但也不难做出调整，一直以来中国海外投资大多流向美国，而在英国脱欧之后，这一趋势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或许是英国脱欧事件的大赢家。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可能会变弱，并被英国脱欧谈判、控制移民、将边缘国家留在欧元区等内部事务缠身。美国也有可能因欧洲带来的这些挑战分心。而这却给了中国更多机会追求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并使之与欧洲国家在各种问题的谈判上占据优势地位。离开欧盟的英国可能迫不及待想要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所以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和投资协议上做出此前欧盟所不愿做的一些妥协。

法人治理全员聘用 全面预约打包收费 “香港模式”助力深圳医改

石华 香港《大公报》2016年9月9日

近段时间，深圳医改如火如荼，取消事业编制，“去行政化”获得社会高度认可。而深圳医改大步改革，得益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先行先试。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全员聘用、医生廉洁从业、全面预约制、先全科后专科、打包收费制等一系列的全新医院管理模式，让港大深圳医院2012年开门试业以来备受关注，不仅成为“医改样本”的标签，也为内地其他公立医院改革提供示范效应。

港大深圳医院成立以来，因承担着公立医院改革的使命，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医院管理实施董事会、医院管理团队和监事会“三权分立”，这让医院内部管理有很大的自主权。恰逢港大深圳医院运营四年，港大深圳医院院长邓惠琼接受了大公报记者专访。邓惠琼表示，体制方面是有所不同，但是医院并没有自作主张，所有的改革都经市政府同意并得到了支持。

与实行编制管理的医院不同，港大深圳医院不再以级别定薪，而是以岗定薪。“与香港医管局差不多，港大深圳医院的医生有三个不同的级别，顾问医生平均年薪88万元（人民币，下同），副顾问医生平均72万元，住院医生平均是46万元，整体平均下来医生的年薪是51万。”邓惠琼表示，深圳医生的平均薪水是每年30万元左右，从薪酬来看，港大深圳医院对年轻医生是有吸引力的，也可以把清廉的风气带进来。

“高薪养廉”让医院回归公益在邓惠琼看来，“高薪养廉”是对医疗专业人员的尊重，也是让医院回归到公益性的措施之一。除高薪外，更多内地医生选择港大深圳医院是因为它与国际接轨，有去香港和国外进修的机会。许多医生反映，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医生，收入透明化、公开化，并受到病人的尊重。

做手术给医生红包似乎在内地很常见，然而港大深圳医院对此坚决抵制，一经查实，坚决开除。邓惠琼表示，目前没有出现一例医生私自收受红包的情况，虽有患者硬塞的情况，但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帮助一些困难人群就医。此外，医生的收入仅仅与诊疗质量和岗位级别有关，而与看病数量、开药多少、检查多少“脱钩”，使得港大深圳医院有效地杜绝了过度医疗。

充足看诊时间增加患者信任

同时，“全科打包收费”也是港大深圳医院在内地的一个改革：200元全科打包费用括了挂号、诊查、基本检查、非严重伤口处理费及七天内基本药品费等，而深圳市其他同级医院的门诊次均费用在300元到400元左右。邓惠琼介绍，约八成的病人在全科都可以看好。

“深圳普通专科医生的门诊费用平均为20元左右，港大深圳医院将专科医生诊金提高到100元，这个定价综合考虑了我院团队诊疗模式下所产生的成本，包括需支付医护人员的薪酬以及医生需保证每名患者能够得到10-20分钟的沟通时间。”邓惠琼说，由于保证了病人足够的看诊时间，医患充分沟通，增加了患者的信任感，医院投诉率也因此一直维持在业内非常低的水平。但她也表示，医院对打包的病人也有选择，比如高危的病人不适合。

运营5年后，港大深圳医院将需要自负盈亏，因而其收支状况一直备受关注。对此，邓惠琼透露，从2014年开始，医院已经做到了收支平衡。

经济广角

今年有望实现经济增长6.7%左右

澳门《新华澳报》2016年8月30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9日在北京发布的智库报告指出，2016年尽管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形势，但应看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一系列稳定经济增长措施的效果将逐步显现，预计经济下行态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得到抑制。

这份名为《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的智库报告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缓中趋稳，继续保持中高速平稳增长态势的可能性较大。

在国际经济不出现较严重动荡的情况下，通过加大供给侧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实施扩大需求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2016年中国有望实现经济增长6.7%左右，经济结构持续得到改善。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40637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国家统计局官员表示，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为完成全年经济目标奠定了较好基础。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报告指出，2016年，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增长承受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首先，国际环境更为复杂严峻。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令人失望且不平稳，这代表了国际组织对2016年世界经济的预期并不乐观。

其次，受前期形成的产能规模较大和当期需求不足的影响，中国一些产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主要在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玻璃等产业和产品上。传统产业去产能去库存任务非常艰巨，2016年工业生产将面临更大压力。

报告认为，当前中国政府正在通过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向社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通过市场准入、财税、国企、商事、要素价格等方面的改革和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政府提出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让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力，支持经济增长。

未来十年中国将迎消费黄金时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9日在北京发布智库报告指出，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市场规模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国内消费需求或接过投资和出口的接力棒，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9日在北京举行系列成果发布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撰写的《未来十年中美经贸关系》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进行分析展望，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图景是：中国将成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将稍低于上个十年，但经济发展的品质将大大提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消费结构将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将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至2020年，中国进口规模将达到12万亿美元以上，期末国内市场规模将超过160万亿元人民币。

世界银行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经济中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011年的42%降至38%，消费占GDP的比例由56%增至60%。美国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预期，中国消费仍将加速增长，并将接过投资和出口的接力棒，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2020年，中国的消费总量将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2%。中国新增消费已于2008年超过美国，并将在2020年达到世界新增消费的20%。预计2020年中国新增消费将大致为美国新增消费的两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素组合和资本进入的重要国家，并逐步成为对外投资的大国。中国将继续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预计到2020年城市化水准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同时，中国还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始终是未来十年经济工作的主线，以支持一个经济大国可持续发展。

下半年财政政策空间较大 减税空间仍然存在

张明明 香港 凤凰网 2016年8月15日

从金融危机以来的政策实践来看，为应对经济低迷，各国宏观政策加大了宽松力度，特别是货币政策不断创新，不仅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

甚至全球有日本、丹麦、瑞士、瑞典、匈牙利等国家以及欧洲央行实施了负利率政策，意在刺激商业银行向企业与个人发放贷款，刺激消费与投资，以支持经济增长，缓解通缩压力。

然而，效果不容乐观，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进一步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IMF预计今年、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分别为3.1%、3.4%，均较今年4月预测下调了0.1个百分点，并指出英国脱欧导致经济、政治和制度的不确定性使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此外，考虑到新兴经济体贸易增长乏力、投资低迷、工资水平难以提升以及商业活动放缓，OECD预计2016年全球增长仅为3%。突破理论创新的负利率，在实行过程中，也面临着对抗通缩效果有限，侵蚀银行利润，削弱商业银行存款创造能力等有悖于负利率实施初衷的矛盾，甚至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而对投资者心态产生了负面影响，超出政策制定者预期。例如，今年欧央行与日本央行在负利率宽松政策出台之时，欧元与日元都出现单日非贬反升的情况，背后暗含了一种绝望的态度，反映了投资者预期混乱、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的担忧。

更进一步，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宽松货币政策似乎也在遭遇挑战。例如，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先后六次降息、五次降准，并通过PSL、MLF、SLF等定向操作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然而，尽管货币政策保持宽松，但经济仍然疲软，7月消费、工业生产、投资数据表现普遍不佳。其中工业增加值同比降至6%，比6月继续回落0.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8.1%，比1-6月回落0.9个百分点，低于预期。同时，企业经济活动仍显疲软态势。

一方面，企业持币观望、谨慎投资的现象有所增加；体现在M1增速持续提高，从2015年3月的2.9%提高到今年7月的25.4%，M1与M2增速的差距逐步扩大，高于同期M2增速15.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民间投资持续下滑，今年1-7民间投资增长2.1%，其中，6月、7月连续负增长，凸显企业对投资前景的悲观预期。上述情况甚至被称之为中国企业已陷入了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流动性陷阱”。

面对全球货币政策困境，学界与政界纷纷开出药方。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就曾提出，“国际金融中过度利用货币、负利率等政策，无助于实体经济，有可能增加投资资本的套利行为。建议各国加快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供需结构，引导实体经济发展。”而经合组织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也提出“现有的货币政策其实做的是不够的，现在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包括结构性的改革。”

在笔者看来，全球货币政策确实有不可承受之重，承担了过多力不从心的责任。若要真正走出危机泥潭，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各国为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已经是无法回避的。

财政政策空间仍然较大

据笔者观察，当前财政政策的缺位现象广泛存在。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债务上限提升由于受制于两党政治，作用有限；欧盟虽然整体债务率要低于美日，但由于欧元区仅为货币同盟并非财政同盟，前期债务危机深化，如今债务国家紧缩财政是主基调。特别是，欧元区的德国得益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2015年财政盈余121亿欧元，连续两年没有联邦财政新增债务，考虑到欧元区整体疲软的经济环境，财政盈余的出现无异于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欧央行竭尽全力放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德国却在紧缩财政，这样的政策组合似乎需要改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面临货币政策有效性递减的现状，积极财政政策也在下半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被寄予厚望。虽然有担忧认为，增加财政支出会加大中国的债务风险，但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债务问题主要体现在结构性矛盾，如企业债务增长过快，杠杆率过高的事实，而居民杠杆率与政府整体杠杆率在国际比较而言都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政府债务方面，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足20%，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仍有较大空间。今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1%，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5.1%，赤字3651亿元，占GDP比重1.1%。根据以往情况，一般上半年政府财政往往是盈余的，说明当前积极财政已有所体现。而早前两会通过的今年财政赤字已经上升至3%，显示下半年实施空间仍然较大。具体来看，下半年财政政策预计有如下亮点：

一是减税空间仍然存在。今年5月1日，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全面推开，早前国务院估计企业减税规模或将超过5000亿元，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8.7%，营业税同比增长15.6%，营业税增速仍然保持较高水平，营改增对企业减税的效果尚需释放。同时，营改增从短期来看对部分行业也存在税负增加而非减少的现象。因此，未来合理税率与抵扣存在改进空间。同时，个人所得税改革，下半年有望加速推进。以家庭为单位，对养老、二孩、房贷利息等家庭负担纳入抵扣，有助于减轻个人税负，进而促进消费与改善居民福利。

二是债务置换持续推进。相比于去年3.2万亿债务置换，今年置换额度进一步加大，或将达到5万亿。债务置换对于经济下行阶段，财政收入压力较大，但承担了不少财政支出责任的地方政府而言，十分迫切。根据早前财政部介绍，今年约5万亿元的置换债券亦可以给地方节省利息支出约2500亿元，而为地方政府下半年加大对基建投资的资金支持提供了空间。

三是基建项目或将加快。基建投资是支持上半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这主要受益于前期项目审批加快以及政府投资支出的加大，预计下半年相关基建投资或将加大。同时，考虑到“十三五”投资项目中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相继落地，预计下半年财政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将进一步增大，并成为支持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是更加侧重于民生保障的支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成为下半年财政支出的亮点。中央下半年要把去库存和补短板的指向，同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而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部署建立健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系，考虑到“十三五”期间要有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这对应着农民工相应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与中央转移支付。

五是PPP项目加速。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大幅下滑，处于对经济前景与政策变动的担忧，民间自发投资尚且意愿不足，参与PPP的热情自然更受到影响。截至6月末，全国全部入库的PPP项目9285个，总投资额10.6万亿元，但落地率仅为23.8%。虽然政府希望加速PPP项目落地，但社会资本热情不足，原因在于一方面对与政府部门合作的地位存有顾忌；另一方面，对项目的盈利情况、长期资金来源等存在担忧，毕竟PPP项目大多涉及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大多带有公益性质，现金流估算往往面临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因此，如何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仍是难点。

六是去产能加快，相关安置支出加大。今年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是重点任务，但上半年全国钢铁去产能1300多万吨，煤炭退出产能7227万吨，考虑到全年两行业去产能目标任务量分别为4500万吨和2.5亿吨，二者完成情况均占全年目标的30%左右，下半年去产能可能加快。而这也需要对人员安置做出更多安排和财政支持，早前人社部已经表示将有一千亿专项资金用于人员安置，预计下半年对此领域的财政支出有所加大。

七是加快财政存款的使用。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从数据来看，财政存款前5个月呈现持续攀升态势，5月末升至3.48万亿。而这也引发了财政部的担忧，财政部5月时曾发文指出，部分地区存在着预算下达不够及时、预算执行进度偏慢、政府置换债券资金支拨不够及时等问题，导致库款规模偏大、库款保障水平偏高，财政资金不能及时形成支出，难以发挥政策效益。而财政存款有所下降，6月降至3.18万亿，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预计，下半年财政存款下降进而盘活存量财政资金也是可以预期的。

持续推进供给侧改革

在货币政策面临束缚的当下，未来发挥财政政策的空间仍然存在。当然，不可忽视的是，积极财政政策能否取得理想效果，还取决于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情况。如果缺少必要的改革，财政支出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比如在推动新型城镇方面，若要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除了必要的公共服务支出支持，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必不可少；而PPP方面，政府意图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但民间资本仍有顾忌，积极性不

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往政府在项目推进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使得民间资本难以盈利；同时，去产能与国企改革联系密切，短期对人员安置财政支出是必要的，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唯有切实推进国企改革才能破解产能过剩顽疾。

因此，笔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调整需要持续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第一，财税改革。按照顶层设计，下一步的财税改革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税制改革，二是财税管理体制改革，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以营改增为例，其是下半年企业减税的主要方向，但考虑到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两者分享比例为75:25，而营业税除了银行个别行业外，属于地方税种。营改增后，地方税收体系同样需要适当改变，如房地产税改革，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权远远小于事权，差距过大的局面，否则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也难以支持基建投资进而起到稳增长作用。

第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一直以来，PPP模式备受政府青睐，但落地程度并不高，关键在于没有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PPP模式虽然是当前财税改革推进下，开拓融资渠道、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保证基建投资项目顺利推进的新模式，但若仅立足于此，恐怕也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难有所作为。做到政府与企业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既通过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型，改变政府以往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角色错位，遵守契约精神，公平谈判，才有可能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

第三，国企改革。正如上文所言，加大对企业职工安置的财政支出只是短期内缓解去产能痛苦的必要方式，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国企改革能否切实推进才是问题的所在。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2%。但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8.5%；其中，中央企业利润同比下降9%，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7.1%。国有企业利润低于民营企业，但往往大量占有资源，导致僵尸企业大量存在。从这个角度而言，国企改革是化解产能过剩的关键。

第四，土地改革。根据《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的明确要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另一方面，要通过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逐步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相关权益退出机制，积极引导和优先支持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相关权益，但现阶段要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而这意味着土地改革也需同步推进，才能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第五，户籍制度改革。尽管当前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但这是基于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能够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群体仍是以户籍为口径，这一意义下的城镇化水平要远低于这一数值。换言之，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制约了城镇化进程。早前城镇化顶层设计也明晰了未来中国各类城市的户籍改革路线，包括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

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等。预计未来户籍改革配套也将加快。

总之，当前全球经济运行的诸多矛盾显示，仅靠货币政策难以为继，还需加大财政支持以及从中长期做出结构性改革。值得肯定的是，与其国家相比，中国仍有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而从营改增、推进新型城镇化、户籍改革等多项政策加快落地来看，积极财政也在发挥作用。在笔者看来，若结构性改革能够切实推进，摆脱货币依赖、重塑经济增长的机会要大于其他国家。

长江经济带发展设目标 重点布局三大城市群

《香港商报》2016年9月12日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近日正式印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关问题逐一进行解答。纲要设立了两大战略目标：到2020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创新驱动取得重大进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规模，培育形成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到2030年，水脉畅通、功能完备的长江全流域黄金水道全面建成，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全面建立，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示范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

纲要描绘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带动周边协同发展

负责人称，空间布局是落实长江经济带功能定位及各项任务的载体，也是长江经济带规划的重点，经反覆研究论证，形成了“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的思路，提出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格局。“一轴”是指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以沿江主要城镇为节点；“两翼”是指发挥长江主轴线的辐射带动作用，向南北两侧腹地延伸拓展；“三极”是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主体。

“一轴”是指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以沿江主要城镇为节点，构建沿江绿色发展轴。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产业和城镇布局优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引导人口经济要素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集聚，推动经济由沿海溯江而上梯度发展，实现上中下游协调发展。

“两翼”是指发挥长江主轴线的辐射带动作用，向南北两侧腹地延伸拓展，提升南北两翼支撑力。南翼以沪瑞运输通道为依托，北翼以沪蓉运输通道为依托，促进交通互联互通，加强长江重要支流保护，增强省会城市、重要节点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

能力，夯实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基础。

打造三大增长极

“三极”是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造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

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可充分发挥上海国际大都市龙头作用，提升南京、杭州、合肥都市区国际化水平，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在科技进步、制度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长江中游城市群，增强了武汉、长沙、南昌中心城市功能，促进三大城市组团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城市互动合作，加强湖泊、湿地和耕地保护，提升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

成渝城市群，提升重庆、成都中心城市功能和国际化水平，发挥双引擎带动和支撑作用，推进资源整合与一体发展，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发展优势产业，建设特色城市，加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与互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保护环境摆在首位

负责人称，目前，长江经济带发展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长江水道存在瓶颈制约、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区域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等。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首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生态功能分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强化水质跨界断面考核，推动协同治理，严格保护一江清水，努力建成上中下游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绿色生态廊道。

另外，交通运输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先手棋。要着力推进长江水脉畅通，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统筹铁路、公路、航空、管道建设，率先建成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支撑力。

中国将构建电商标准体系

张宇《香港商报》2016年9月12日

2016中国电子商务标准化峰会9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完善跨境电商生态、协助产业与电商融合、服务优秀企业”。

在主论坛上，国家电子商务标准化总体组秘书长咸奎桐致辞表示，中国电子商务跨入标准化时代已成大势所趋，电子商务标准的制定及实施，将有力推动电子商务朝着规范化发展迈进，进一步提高电子商务行业的进阶发展，从而为社会与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引导电商发展新模式

会议主办方领导，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洪全演讲时指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作为推进电商相关标准技术的工作机构，致力于推进中国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与相关标准化进程，落实电子商务与标准化的市场机遇发展，并通过与各行业协会广泛合作，探索推进产业发展引导电商发展的新模式。

电子支付领域专家、中国社科院支付研究中心主任杨涛表示，网络支付新规的落实，标志着电子支付领域将发生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变革，实名制新规将引导中国移动支付产业迈入更为合理、有序的发展快车道，未来的电子支付标准与结算体系将会更加完善和健全。

2016中国电子商务标准化峰会旨在搭建标准化交流平台。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有关领导会上致辞时表示，推进电子商务标准化发展以及制定电商标准已经成为政府部门、机构团体、电商企业、普通民众等社会各界的一致共识。标准化不仅能引导电子商务走向规范发展，同时还是紧密联系、协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有机载体。紧紧抓住电子商务与标准化的市场发展新机遇，开启中国电商标准化的崭新时代。

科教文卫

华语片“走出去”须重视海外市场

香港《文汇报》2016年9月12日

第73届威尼斯电影节落幕，菲律宾影片《The Woman Who Left》夺得最高荣誉金狮奖。本届虽不乏中国元素，例如“聚焦中国”论坛畅谈中外合拍等，却难掩华语电影缺席主赛场之尴尬。

素有“电影节之父”之称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与中国电影缘分深厚，自上世纪80年

代初，中国电影便频频亮相该影展，从《悲情城市》、《大红灯笼高高挂》到《桃姐》、《人山人海》，华语电影斩获多座金狮和银狮，并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

20多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迅速，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而在对华语片青睐有加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今年华语片却在主竞赛单元“零入围”，引发中外电影人深思。

过于商业化 流失艺术电影人才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巴尔贝拉指出，中国电影过于商业化，“不能把整个电影制作集中在商业片、喜剧片和动作片上，只有多元化，才能在国际平台和市场上有吸引力。”艺术电影制片人李园则认为，目前电影投资并没被看成是对文化的投资，而是快速赚钱的机会，制作周期长、票房前景难测的文艺作品，自然得不到投资人的青睐，导致艺术电影人才不断流失。

有专家认为，中国电影过度关注本土市场，也导致其难以真正“走出去”。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目前都定位在本土市场，海外票房和销售呈下降趋势，前年国产影片海外票房和销售总收入占国内票房比例仅6%。对海外市场的忽略，也让华语片陷入本土化困境，尝试“走出去”时频遇冷。

中国首制细胞治疗应用国际标准

香港《成报》2016年9月9日

医疗人员今后可以参考《神经修复临床细胞治疗指南》和《脊髓损伤神经修复临床治疗指南》工作，这是针对细胞治疗临床应用和脊髓损伤修复治疗的首批国际标准。

指南由国际神经修复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制定，临床细胞治疗技术用于造血系统以外疾病，是世界公认继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后，最有价值的21世纪临床治疗技术，现已广泛用于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肝病、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内分泌疾病、疼痛、肿瘤等疾病的探索治疗研究。

各国法规不尽相同

然而，从法律层面上看，全世界各国对于细胞治疗这种新兴医疗技术如何管理并无统一认识，各国制定的法律法规也不尽相同。

神经修复学创立人、国际神经修复学会创始主席黄红云教授，在召开的第九届国际神经修复学会（IANR）年会上表示，这两个标准是在中国相关标准基础上修改制定的，是中国研究人员主导制定健康领域的国际标准、规范的典范。

这类标准的制定对规范医疗行为，推动临床细胞治疗研究，促其持续创新，增加

中国医学界的自信，提升中国医学的国际影响力，将产生重要影响。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中国新农人涌现成为打造现代农业新引擎

澳门《新华澳报》2016年8月16日

在吉林省农安县两家子村休闲农业园里，黄瓜、番茄、木耳等正在采收。园区共有63栋大棚，157名村民在此就业。两家子村党支部书记于文侠是园区投资者。从建筑业挖到第一桶金后，于文侠去年决定回到家乡务农，带领村民搞现代农业。

在城里学习或工作，再回到农村创业，这就是中国兴起的“新农人”群体。这个群体教育程度高、学习能力强、乡土情结浓，熟悉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精通并善于利用网际网路思维。中国“新农人”群体的出现，不仅有助于解决“明天谁来种地”的问题，以他们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将改写中国传统农耕格局。

35岁的李华靓拥有大专文凭，现在是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晟华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目标就是让村民资源共享，统一品种、统一农资、统一销售，节本增效。

李华靓说，2014年，合作社推出家庭农场体验等休闲农业项目。会员在秋季能收到定制地块上产出的绿色大米，还附赠数只稻田鸭。同时，会员家庭可以体验农场除草、收割等。

与传统农民重视产量不同，“新农人”更注重品质效益。“虽然我们种植的果蔬还是一样的果蔬，但品质高出一个档次，因此价格也比普通果蔬贵。”于文侠说。果蔬温室大棚只是于文侠的第一期规划。“我们正加强宣传，吸引更多市民到园区采摘和体验农家乐，同时正在建设豆制品加工厂、玉米面粉厂等农产品加工厂，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通化禾韵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蓝莓苗木繁育场场长和植物研究所所长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都心甘情愿地扎根山沟沟。

蓝莓种植场场长陈亮是名“80后”，吉林农业大学毕业后就签约到这里工作，经过多年努力，现在已经挑起为公司繁育、选配和种植蓝莓苗木的重担。

陈亮说，当初来这里工作就是看好企业前景，符合国家倡导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理念。尤其这些年，企业通过农民土地流转，和农民合作社一起种植有机蓝莓，为开发中高端的蓝莓产品提供大量原料。

通化禾韵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殷秀岩说：“农业企业特别需要农业专业大学生。像我们公司是有机蓝莓种植、加工、繁育一体的公司，大学生有很大发展空间。”

吉林省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磊表示，“返乡创客”的涌现，表明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正在加快发展，虽然数量并不占优，但对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

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等一系列鼓励农民工、大学生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政策。降低返乡创业门槛、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强化返乡创业金融服务、完善返乡创业园支持政策等“优待”鼓舞了“新农人”。

专家认为，在中国一系列旨在鼓励发展现代农业政策推动下，一批“有知识、懂科技、会经营”的“80后”、“90后”“新农人”从城市回到乡村，带回了农业经营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有望成为中国打造现代农业的新引擎。

“光伏+”扶贫模式可持续吗？

冯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9月13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传统的扶贫方式一直被称为“输血”式扶贫，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却无法从根本上帮助贫困县脱贫。若要“授人以渔”，那么就必须要帮助这个地区找到能够自我发展的产业方向，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循环动力——然而，这一直是困扰中国666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老大难”问题。

中国“十三五”规划将光伏扶贫纳入重点工程，总规模15GW，每年建设规模约3GW，占全国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的20%，占全国光伏电池产量的10%。光伏扶贫是希望通过产业创造经济发展活力，创造就业岗位，提高贫困户的收入，也同时助推新能源产业发展。

但是，当前光伏产业不仅在上游制造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游应用的发电产业同样需要面对包括产能过剩、降价、补贴延迟等重重困难，光伏扶贫的可持续性正在面临考验。

期望一箭双雕的光伏扶贫

当前，中国乃至世界正在经历能源更新换代的过渡期。中国的能源使用量和需求量持续增长，但能源结构还是以煤、石油等高污染的化石能源为主，造成雾霾等公共环境污染问题极其严重。从产业升级换代的角度看，光伏等清洁能源正处于发展的初期，将逐渐取代化石能源

近年来，中国光伏行业上游制造企业生产过剩，但是下游应用不足，光伏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比较低。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4318万千瓦，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但是从光伏发电占比来看，中国与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2015年，中国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等印发了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在安徽、宁夏、山西、河北、甘肃、青海等省份三十余个县开展首批光伏试点，计划利用6年时间开展光伏发电产业扶贫工程。

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新能”）副总裁王健表示，光伏扶贫一方面是可以促进中国能源产业升级换代，另一方面找到了一个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的经济发展相统一的窗口，为“精准扶贫”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光伏+”模式的产业链思维

距离宁夏银川时1个多小时车程的盐池县虽说在风光秀美的塞上江南，但其实常年大风吹过，黄沙席卷，寸草难升，长久也未能摆脱贫困的束缚。然而，从去年起该县以光伏发电为切入点，创造就业岗位，提供金融资助，延伸发展特色产业。这种“光伏+”扶贫模式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围绕光伏发电构筑产业链体系，为让贫困县能够自我“造血”，实现经济、环保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万亩盐碱地上，成片的蓝色的光伏板在日光下反射出炫丽的光彩。板下，原本贫瘠的黄沙地长出了郁郁葱葱的青草，为整片土地更添几分色彩。远处的几处村庄，坐落着村级电站，新修的房屋顶上也放置着太阳能发电设备。更远处新建起的滩羊养殖基地里，农户正在进行繁忙的工作。

宁夏盐池光伏综合示范区，首先通过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光伏发电，以解决新能源产业资金需求大，投资周期长，利润相对薄弱的问题，同时为当地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带动经济发展。然后，从光伏产业衍生出结合当地特色的滩羊产业链创造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此外，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还与盐池县政府共同成立了担保公司，整合当地的金融资源，为农民、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担保支持，通过产融结合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他们预计，盐池县有望通过光伏扶贫在2018年之前全县提前脱贫。

中民新能董事长白锐平在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候表示，光伏扶贫可以让扶贫成为一种可持续的长效机制，一方面企业有源源不断的盈利的源头活水，这是扶贫的一个可持续的基础，另一方面是由过去“输血式”的单向扶贫变成当地贫困户自主的，双向互动式的扶贫，使贫困户有尊严，看到致富的希望，看到自己的未来。

“光伏+”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光伏扶贫美好的愿景之下，首先面临的就是就是光伏行业限电、降价、补贴延

迟三座“大山”。

北京大学教授曹和平近期为FT中文网撰文时指出，新能源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资金需求量大，周期长，投资成本过高，如果私营企业进行投资，很可能将会出现成本收益倒挂的局面。宁夏盐池正在建设的单体光伏电站，总装机2000MW，总投资达156亿元人民币，非一般财力的私营企业可以承受。现在包括光伏发电在内的新能源发电主要依靠价格和补贴政策勉强生存。但是据报道，最后一批补贴发放已是2013年8月前并网的，拖欠的补贴不仅推高了光伏电价，使其处于与传统火电价格竞争的不利地位，也蚕食着电站的收益，但是累计约400亿元的补贴缺口却不能在短期内填补上。而且，2015年年底中国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降低光伏电价，使得光伏发电的原本微薄的获利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王健表示，光伏产业融资成本很高，利润薄，周期长，属于天然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小规模的企业确实难以可以通过规模化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实际上降低了成本，比如进行通过规模化集中采购，能以较低价格取得高效率的单晶硅发电组件，规模化地发电增加收益。

但是规模化地发电又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限电。西北部地区由于煤等化石能源资源丰富，是传统的火电发送地区，同时也兼具光照强度大、风力强等自然条件，使得近年来光伏、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产业也在西北地区聚集。但是当地电力需求较弱，大量电力需要向东部地区输出，而电网配套设施相对落后，无法承受太多新增电量输出，导致生产的电力只能被弃用。据媒体报道，2016年中国第一季度光伏发电量达1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但是全国弃光限电约19亿千瓦时，相当于光伏发电总量的14%不能上网，其中宁夏弃光限电2.1亿千瓦时，弃光率达20%。盐池光伏项目一期首批首年发电量约为5.75亿千瓦时，每年有望实现约4.66亿元的工业产值，但是大规模的弃光限电将会让这样集中式光伏电站面临着盈利挑战，未来的发展情况还有待观察。

白锐平表示，在光伏扶贫的过程中，中民新能确实将当期的部分盈利进行扶贫，但是这种投资可被看做换取未来长远发展的成本，如果真能把扶贫的模式做成一个好的商业的盈利模式的前景是非常可期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有着盈利愿景，但是光伏扶贫主要依托的光伏发电产业还面临着诸多瓶颈，有较多的推广障碍。现在说盐池有望在2018年前“脱贫成功”还为时尚早。

大城市人口调节要均衡不要平均

刘远举 香港《凤凰周刊》2016年8月15日

近日，一则北上广隐现人口拐点的新闻引发热议。报道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三地政府2016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北上广等大城市已隐现人口拐点信号。

这样的结论可能让主张严控和疏散大城市人口的管理者，以及认为资源被抢占的大城市居民松一口气。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仅北上广出现人口拐点的结论有待商榷，即使赶人政策真的成功了，人口减少对大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首先人口分布围绕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人类社会自组织的一个过程，虽然它在表现形式上是偏离均匀的，但本质上却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其次人口分布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更廉价地供货商品，不管是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等都是如此。然而今天我们听到很多所谓的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目标，实际上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这种不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的政策不仅难以实现，还会造成大量浪费。

资源问题是个伪命题

近年来随着大城市规模和人口的扩张，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即认为城市资源是有限的，可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上限的，所以应该严控大城市人口数量，特别是低端劳动人口数量。

实际上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都很关键。社会发展少了年轻人是不行的，例如养老问题，养老金是否充裕只是表象，最关键的是年轻人与老年人的配比。

如果一个地方有90个老人、10个年轻人，90个老人需要依靠10个年轻人养老，年轻人的工资就会非常高。而依靠外地年轻人缴纳的社保，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社保资金一直较为充足，可以支撑当地较好的医疗等保障。

至于大城市是否应该控制低端劳动人口，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口结构既包括年龄结构，也包括分工结构。以前我们提倡人人平等，只是革命分工不同，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从市场角度来看，对于大的社会分工而言，任何工种都是有意义的。在大的社会分工体系里，各行各业相互配合就像一架波音飞机，自动控制系统的计算机与发动机上的一个螺丝，或者是机翼上的蒙皮，哪一个更重要？答案是都重

要。一个买菜要走三公里、请不到保姆或者请保姆很贵的城市，不会是宜居城市：一个请一位前台很贵、请不到低端文员的城市，纵使拥有工程师高技术人才，也不会是有竞争力的城市。

一个城市的人口分工结构是非常复杂动态的系统，唯一能决定这个结构的就是市场。所以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来划定低端劳动人口，甚至驱逐低端劳动人口，实际上伤害的是城市的宜居指数与竞争力。

另外，人们所担心的资源问题也许是一个伪命题。以土地资源为例，人们通常把土地看做不可再生资源，但实际上不可再生的是土壤，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风化形成。但建筑用地是可以反复利用的，拆迁就是建筑用地反复利用的形象例子。还有人们眼中所谓的稀缺资源例如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其实根本不是资源，因为从长期来看，医生和教师都是可以通过医疗系统、教育系统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产生。医院、学校的构成除了人以外，就是设备与建筑，这些都是生产的结果，都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种产品。如果把人也视为教育系统的产品，那么整个医疗体系、教育体系都不是资源而是产品。从本质上讲，医院、学校与餐馆、理发店没有区别；医生、教师与厨师、理发师没有区别；实验室、核磁共振仪与灶台、烫头的机器没有区别。至于大城市被诟病的交通问题，也可以通过良好的规划，利用新技术新方式来解决。同时技术也可以提供新的资源。

难以改变的胡焕庸线

近年来，北上广已过度拥挤的说法甚嚣尘上，大城市的人口政策一直是疏散和限制，国家层面也不断强调各地区要平衡发展。

实际上这种论调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这样的人口政策看似公平，却并不符合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是人为管控可以轻易实现的。在这里平衡的意思应该是指在市场条件下，人口经过自由选择聚集，最后形成的一个均衡状态，而不是平均分布。然而我国几十年来发展的特殊经历使人们形成平均才是好的观念。大城市这种高度偏离均衡与计划经济的平均观是矛盾的，这必然使国人更容易强调大城市经济局面的负面因素。

但是所谓的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并不符合实际发展情况。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如果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画一条线，我国的大部分人口和经济贡献量都集中在线的右侧，该线以东地区用43.71%的国土面积养育了94.39%的人口。胡焕庸线基本上可以看做经济规律的结果，虽然多年来从国家层面一直试图破解胡焕庸线，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胡焕庸线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特点并非我国独有，从比例看，纽约市人口占到了美国3亿总人口比例的2.7%；而东京都则聚集了全日本10%的人口，至于范围更大一些的东京都市圈人口更高达3600万，也就是说每3个日本

人就有1个生活在狭小的东京圈范围内。

一个城市究竟可以容纳下多少人口？今天社会学者更认同的另一个规律是人口密度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关。也就是说GDP占全国多少比例，人口也该占全国多少比例。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成都和武汉这9个城市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近11%，GDP之和占全国总量超过20%。从这个规律看，这9个城市的人口还未达到均衡。例如即使北京市人口总量达到目前政府所设计的上限2300万，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76%时，按照北京的GDP占全国3%，北京市人口与GDP的比例离均衡还相差很远。

不适合的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聚集所带来的问题一度也曾给全球许多大城市带来困扰。

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国际大城市都曾经尝试过控制人口，但无一成功。其中日本对东京人口控制的努力，不但影响到东京的国际竞争力，甚至波及到整个日本的竞争力。

与外国相比，我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还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主流观念仍不认为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必然形态，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各种罪恶的根源，是城市病的发源地。所以许多人认为我国根本不需要发展大城市。这样的认识导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方针都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今天这样的意识形态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大城市更多更自由的舆论，更密集的人口规模，更高的人口素质，产生了1+1>2的效果，为人们带来权利增量，也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一个人从农村或者小城市迁徙到了大城市后，他的公民权利实际上增加了，例如在一线城市这种陌生人社会中，人情和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从而抑制了裙带和寻租，让人们获得更公平的机会。实际上现在一些大城市主张驱赶外地人的声音之所以如此强烈，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大城市的发展，促使城市户籍居民拥有更高发言权利的结果，虽然他们试图通过驱逐他人以维持自己便利的方式是错误的。

近年来，随着人口增加可以带来经济发展红利等人口经济学观念的传播与普及，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人口增加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国人认为是国家发展的阻碍，但是大城市因为人口众多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仍让人们无法对城市人口聚集现象变得宽容和理解。其实大城市人口密集所产生的问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的。大城市为人民带来的权利也是无法阻挡的，大城市的人口政策应该尊重经济规律，尊重社会规律，尊重人民的权利。用堵人甚至以教育控人这样的手段，不但最终会被证明无

效，还会埋下不和谐的种子，而且是饮鸩止渴。

中产阶级崛起的喜与忧

韩咏红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年9月2日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曾在2013年6月发布调查报告称，预计到2022年，从购买力论，中国76%的城市人口将位列中产阶级大军。

这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飞快增长带来成果。相比之下，在2000年，只有4%的城市家庭可算得上中产阶级，而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猛涨到68%。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加快，但是2022年城市中产家庭达76%的前景，应该不难实现。

报告也认为，随着中国的工资上涨、金融改革与民营企业地位提高，这一切如进展顺利，到2022年城市家庭收入将倍增，届时有高达54%的城市中产家庭属于中上收入群体，而在2012年，这个比率只有14%。

这份三年前的报告，近日又引起一些中国境内外媒体的注意。事缘8月26日，一家英文投资咨询网站Truewealth Publishing再次引述其中的数字，标题起了十分吸睛的“中国消费者将如何拯救世界？”。

老故事再获“新生”，足见“中国中产”与“中国消费者”这个崛起的大军，在媒体中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当前，更多公司要绞尽脑汁如何分食中国市场这块大饼。

不过，随着今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减速，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消费者的信心将受到怎么样的影响，也正引起关注。

根据尼尔森的数据，今年首两个季度的中国消费者信心，分别是105点和106点。该指数出现了反弹的好现象，但距离它在2013年第四季到2014年上半年的111点历史高位，仍有明显差距。刚过去的8月份，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的调查更亮出警讯：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7月回落2.2%，降至111.5点。受访者对未来商业状况、就业情况、个人财务状况都不比此前乐观。

中国民众这些年的旺盛消费热情，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经济奇迹给全社会注入了的强大信心。在此之上，尝过苦日子的民众对物资的渴求，以及改革初年官方奠定的去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倾向，这些因素都合力将中国的消费主义推向高潮。

国家层面的实用主义，反映到社会与人民具体生活中，一方面是理性，另一方面则是物质主义，构成了消费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有学者依据西方经验，认为中产阶级壮大与市场经济，将带来中国的民主化。类似“预言”却屡

屡落空，原因就在于，虽然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经济，也让民众有了更多个体选择的自由，但在价值理念方面，官方与民间是统一且稳定的。

官方以经济成长来巩固执政地位与确保执政安全，民间也普遍以拥有物质的多寡，例如有没有车、房，来取得个人安全感与社会地位。近几年来这个特点更为明显，从社交媒体的讨论上就可看出，在中国的80后、90后群体中，最多人关心的话题不是时政，而是成功学。虽然偶尔一些可能威胁中产阶级切身利益的事件，例如环保危机、雷洋事件等，可能引起一时的热烈关注，但只要中产的具体利益最终能得到保障，社会治理就不成问题。

不过，高涨的消费主义也是把双刃剑：如果中国经济减速过于明显，物质增长无法持续，社会不满将浮出水面，并引发领导层的不稳定。然而，即使发生这个局面，中国未必能很快形成新的主流价值，实现民主化。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成效，就是形成了中产阶级群体，至今改革的重大目标，也应该是稳住经济，经济增长始终是社会稳定的“命脉”；其次，富起来的城市中产对明确的规则与法治环境的需求十分迫切，依法治国是避不开的命题。最后，政府如何切实聚焦于这两个目标，不分心，在当前形势下可能也是另一项挑战。

综合治理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刘华 杨依军 段菁菁 澳门《华侨报》2016年8月31日

再过几天，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杭州举行。这是中国近年来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将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征程中留下浓重一笔。

这些年来，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矢志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努力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现出发展中大国的担当。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往来，同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这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郑重承诺，也是基于自身发展历程作出的经验总结。

经过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2013年至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3%，明显快于同期世界经济2.4%左右的年均增速。中国经济

体量持续扩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5%。

面对中国快速发展，外界有惊叹，也有疑虑。

“中国决不会称霸，决不搞扩张”“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向世界宣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缘于深厚历史文化基因、符合时代发展进步潮流的战略抉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说，中国不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且推动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

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稳定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到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从为破解“中东之问”贡献东方智慧，到寻求妥善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再到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从全面启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将“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列为G20杭州峰会重点议题……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的承诺。

2016年新年伊始，一个有着五十七个创始成员国的新国际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宣布开业。从中国提出筹建倡议，到正式成立并开业，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亚投行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带有明显的新时代的特征。”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考虑该为世界做甚么贡献，这就是创立亚投行的初衷。”亚投行，是近年来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标志性公共产品之一。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亚太自由贸易区倡议，从互联互通蓝图到创新增长蓝图……开放进取的中国，为人类贡献着一个又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发展方案。

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

2013年秋，传承着古老的丝路精神，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三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吸引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进展之迅速、影响之广泛令人瞩目。

“中国正在做一个其他国家没有做过的事业：不是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而是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国共享繁荣。”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评论说。

近几年，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领域表现愈发抢眼——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新股东、接任G20主席国等

等，都是“制度性话语权”不断提升的有力注脚。

以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在气候变化、核安全等事关全球治理的其他领域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完善已是大势所趋。“新兴经济体拥有更多话语权，才能保证国际经济决策和治理能够反映经济现实。”澳大利亚洛伊国际问题研究所G20研究中心研究员塞恩斯伯里说。

G20已成为公认的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即将举行的杭州峰会将是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代表性最强的一次峰会，这是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均衡化付出巨大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平等伙伴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大家就国际经济事务平等协商、平等决策，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历史的进步。”外交部长王毅说。

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峰会主题，到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从深化国际金融架构改革，到发起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首次在中国举行的G20峰会，处处体现着对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制的追求与期待。

在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这一历史进程中，杭州峰会将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一个坚持和平发展、推动合作共赢、追求公平正义的中国，必将给世界献上别样的精彩。

实名制顾此失彼

郑海龙 香港《明报》2016年9月3日

上月在山东有两名学生接连遭遇电信诈骗猝死，即使疑犯已经落网，不过也不能挽回两个逝去的年轻生命。以其中一名准大学生为例，贫家女徐玉玉被骗，主因是骗子编造了一个为徐家量身订制的教育救助金申请发放骗局。而知道徐申请救助且能掌握到她的个人信息并联络到她的，恐怕除了教育部门没有别的机构。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些个人信息是怎么外泄的？而骗徒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这些信息的？

骗徒精准掌握资料民众难防

这种掌握民众个人信息及需求精准诈骗的手法，往往令人防不胜防，受害人也难以识别真假，最终不仅蒙受金钱损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在上月28日，又发生一名广东潮汕地区女生因遭遇电骗而蹈海自杀的悲剧。

其实内地的实名登记制度早成为骗徒获取个人信息的管道。从火车票实名，到手

机号实名，再到快递实名，要想掌握一个人的个人资料实在有太多方法，更别说通过大数据或者通过黑客攻击。所以，如果没有相关法律规管，就很难建立民众对实名登记制度的信心。

以记者为例，在火车票采取实名制后，记者的帐号在6年内至少两次被劫持并绑定了他人的手机。而有次记者到河北采访，在签卡结帐索要发票时，被要求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称是税务系统统一要求，直至记者强烈反对才作罢。

在现时社会环境下，实名制在防范恐袭和罪案方面确实有着积极作用，但当局推出相关法规时，却顾此失彼，忽略了民众的信息安全和私隐，也为各种诈骗埋下伏笔。近日公安部、中央综治办、中国人民银行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居民身份证使用管理的公告》，迈出保护民众私隐的第一步，但杜绝电骗恐怕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环球视野

全球化治理面临挑战

邵宇 香港《大公报》2016年8月20日

如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形，全球化再度遭遇了大规模的反。西方国家的民众感觉自己并未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收益，相反环境恶化和贫富差距拉大在不断侵蚀了他们对全球化的好感。在这种背景下，大规模环境保护运动此起彼伏，全球公民社会不断发展，世界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因此，缓解西方社会内部的普遍压力成为政治家们拥抱全球治理的主要原因。眼下的趋势又与冷战后的世界局势休戚相关。冷战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极大冲击。美国一家独大，而资本主义制度被某些理论家认为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制度。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世界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自诩西方霸权能够保障世界和平，因此余下的工作就是处理国家间偶尔出现的小冲突，共同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维护和修缮现有的制度了。

国际社会共处之道

“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可以普遍接受的全球性话语和规范。对于一个缺乏全球性最高权威的国际社会来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信任非常孱弱，冲突似乎是国际社会不可治愈的疾病。但全球治理的理念，可以唤起不同文化和国家的共鸣，不同宗教都需要在共生的全球社会寻求共处之道，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够在全球治理中找到利益的交汇点。

在这样一种多方都能接受的历史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得以大行其道。在关于治

理的诸多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因该委员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而广受重视。谁在全球治理？一般认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拥有主权的各类行为体（各国政府）、其下属机构（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和他们的联合体（如欧盟）；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宗教团体和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但在上述三类组织中，全球治理的主体依然是老牌西方国家G7、油气资源富集的OPEC国家，以及由这些国家占据主导的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什么？全球治理的对象，包括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跨国性问题。这些问题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而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通过全球治理解决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高政治和低政治两个大类：高政治的治理领域往往与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密切相关；低政治的治理领域往往是全球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问题，虽然焦点是技术、制度，乃至人文领域的基础性问题，但其问题延伸牵涉的领域涵盖了可持续发展、贸易、投资等诸多影响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例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跨国移民与难民、跨国犯罪和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等。

挑战来自经济失衡

“全球化3.0时代”的全球治理还能适应新的时代吗？其主要挑战首先是全球性失衡。全球化依赖于有效的治理，因此治理方式取决于全球化的特征及其问题。规模巨大且持续增加的经常帐户赤字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弱点，而这种经常帐户的大规模赤字是因为“全球储蓄过剩”造成的。全球资本的大量供给导致长期利率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而这些全球储蓄的提供者却是那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因此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全球失衡，这种失衡不再是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失衡，而是发达工业国家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失衡。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使各国意识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尤其是新兴国家和发达工业国之间的协调。现存的以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宏观经济协调为目的G7和OECD框架已经不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发展。

其次是治理权利分布不均，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组织体系由正式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IMF、WB、GATT/WTO）和国际性论坛（G7、OECD）两种主要形式构成。但是，这些组织的结构越来越不能反映国家间实力的分布、越来越难以应对21世纪的诸多治理难题。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重视并监管过度金融化的失责在金融危机后饱受诟病，而其在援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时采取的双重标准更是直接反映了其组织架构的不合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目标在于关注个别国家经济风险并维护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组织，在有效探查和治理全球性经济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全球社会的期望相距甚远。

发达国家日渐式微

在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中，历史遗留问题、低效率和不公平的问题同样严重。在世界银行集团的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缺乏代表性和影响力，未能体现这些国家的利益。而世界贸易组织也未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并导致了国际社会对贸易体制改革的悲观看法。

最后，原本的大国俱乐部G7形成于1975年前后，意在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和货币危机，协调经济政策，重振西方经济。但是目前，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比重中的下降意味着它不可能再单独支配世界。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计算，西方七国的GDP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2007年的55%下降到2014年的46%。相比之下，金砖五国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则从2007年的14%增长为2014年的22%，这种趋势的持续，将不断推高广大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梯队崛起。

最后的挑战来自治理理念的差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长期受发达经济体的影响、主导甚至是控制，在治理理念上已经打上了发达经济体的深深烙印。这种烙印集中表现在主要治理机构的人员构成、研究方法以及组织文化等方面。治理理念更多的是建立在“华盛顿共识”之上，倾向慎用甚至放弃政府对经济的正常干预，主要强调用市场的手段对成员国的国内经济以及全球经济进行治理。对于不符合市场加自由主义导向的治理理念，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认同和协调。

《两岸和平协议》首次写入国民党政纲

胡文洁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年9月5日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昨天举行“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全会同意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上，深化“九二共识”，并首次把《两岸和平协议》写入政纲。

这是国民党失去总统宝座与立法院多数，以及洪秀柱出任党主席后的首场全代会。她在开幕致词中指出，政党轮替后，过去八年马英九政府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建立的两岸关系“急速冷冻、完全停摆”，不仅两岸互信不再，所有沟通机制中断，和平红利流失。

她也指责蔡英文政府捍卫中华民国主权无能，为了与中国大陆切割，甚至不敢提南中国海U形线（大陆称“九段线”或“断续线”）。她强调，国民党追求台海永久和平，因此要用“和平政纲”对抗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大会随后通过题为“真诚反省、勇于改革”的政策纲领草案。

其中有关两岸关系部分，会议同意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上，深化“九二共

识”，积极讨论以《两岸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可能性，扮演推动两岸和平机制化角色，确保台湾人民福祉。

这是国民党首次把《两岸和平协议》写入政纲。

大会还透露，针对“和平政纲”进行的民调显示，全台有51.5%民众同意此政纲，反对的只有20.2%；国民党的支持者当中，同意和反对各占82.5%和5.2%；民进党支持者同意和反对各为34.8%和37.3%，说明《两岸和平协议》有厚实的民意基础。

国民党指出，因蔡英文政府和民进党不放弃“台独党纲”，两岸关系高度不稳定；在此情况下，国民党要更积极扮演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角色，推动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两岸交流与合作。

不过，原来的政纲主张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如今“一中各表”被去掉，党内似有不同声音。前主席朱立伦和前副总统吴敦义受访时都表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八个字连在一起是大家的共识。

国民党在两年前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落败，今年1月的总统和立委选举再尝败果，全党士气陷入谷底，正急于要“重拾民心、重返执政”。

洪秀柱称国民党在上个月的花莲市长补选获胜意义重大，该党今后要用加倍诚意和努力，把流失的民心“一点一滴的找回来”。

她也发声捍卫国民党党产，指党产绝非原罪，“我们不依恋党产，但求公道对待”，猛批民进党“以清算斗争的方式追讨国民党的党产”，违法违宪，是台湾民主的耻辱。

在推行党委革新方面，为提早布局2018年地方首长选举，国民党规划推动“预选制度”。此外，大会也通过了地方党部主委直选提案，将成立专案小组，讨论配套办法及实施日程。

地方党部直选提案被视为是要削弱洪秀柱的人事任命权，但她表示乐观其成，有信心将制度设置完善，避免地方宿怨纷争造成党内冲突混乱。

学术前沿

解读《“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8月8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下称“规划”）。该规划是国务院确定的22个国家重点专项规划之一，对我国未来5年科技创新做了系统谋划和前瞻布局，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细化落实。本期，我们搜集了部分专家学者对规划进行的解读，整理成文，

以供参考。

规划的特色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劲**：《规划》的特色是把支撑全面转型升级作为根本任务，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作为战略重点，把国家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的协同作为工作方针，把开放共享的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作为新的探索。必将有效促进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伟大事业。（千龙网 2016 年 8 月 10 日）

规划体现了创新自信增强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决胜阶段。在深入实施重大专项的基础上，面向 2030 年部署了 15 个科技创新重大科技项目；围绕现代农业等十大领域构建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围绕生态环保等五大领域构建支撑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围绕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技术体系。规划彰显时代特点。它强调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重大科技项目、国家实验室、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作为重点任务。从上游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到中游的技术创新，再到下游的技术推广和产业化，进行全链条设计。规划要求，全方位融入和布局全球创新网络，深入参与全球创新治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说明创新自信增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进步正深刻改变全球创新版图、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格局。（新华网 2016 年 8 月 10 日）

规划特别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规划突出顶层设计，坚持有序推进，充分体现了需求驱动和创新驱动的紧密结合，特别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进一步确立了迈向创新型国家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的总体目标，进而部署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科学网 2016 年 8 月 8 日）

规划的四大特点 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惊**：首先这是一个科技创新的规划，它不仅关注科学技术研究、改革和发展，更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从创新的全链条进行的一次整体规划。其次，规划更加注重科技的超前引领性，更加关注依靠创新构建先发优势。第三，规划非常关注经济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问题。第四，规划体现国家战略意图和重大部署，比较体系化地提出在深海、深蓝、深空、深地等能够拓展国家战略利益、保证国家战略优势的领域的考虑部署。（新华网 2016 年 8 月 8 日）

规划针对性回应了对创新的需求和期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 22 个专项规划中，科技创新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指出，从国际上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能力的竞争，中国必须牢牢抓住这一轮科技革命引领产业变革的机会。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不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产业结构调整，背后都需要依靠创新，其中科技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对于创新的期待和需求非常高，而本次出台的规划覆盖面很广、涉及领域很宽，可以说有针对性地回应了这种需求和期待。（凤凰资讯 2016 年 8 月 9 日）

分层次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作出部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规划》充分体现了科技与创新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规划》是从整个创新全链条出发，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化，对创新全过程进行的规划。突出了顶层设计、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具有整体性。创新实际上是把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过程，因此不仅仅是一个科技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经济概念。这样一个“政策包”，更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否则就可能导致政策之间出现矛盾，甚至互相抵消作用。《规划》的另一个亮点是，突出强调了区域创新《规划》实行分层次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强调“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创新发展”“建设带动性强的创新型省市和区域创新中心”“系统推进全面改革创新改革试验”。这等于明确分了四个层次，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作出战略部署。（《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1 日）

解读《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近日正式印发。纲要从多个方面描绘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本期我们搜集了多位专家、学者对纲要的解读，整理成文，供领导参考。

将生态保护提到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首位 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特聘教授**徐长乐**：将生态保护提到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首位，有三大重要战略意义。第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长江经济带的自然承载力和自然资源禀赋对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其生态保护问题非常重要；第二，长江上中下游流域经济之间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生态联系非常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流

域地区，需更加注重整个地区的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其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比其他区域更加紧迫；第三，长期以来，整个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却未考虑开发利用的合理性及生态保护，致使整个地区的环境生态在人类强势活动和长期开发利用下，出现明显的生态衰退、恶化、退化等现象。若不加以有效制止和遏制，将影响中国整体的生态环境。

为此，《规划纲要》还提出四大创新机制：一是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二是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控；三是建立长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四是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大河网 2016年9月20日）

鼓励“飞地经济”模式 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特聘教授**徐长乐**：“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互相独立的行政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突破原有的体制或机制限制，借助于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采取跨越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战略，最终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飞地经济’是一种联合建园的方式，将是未来要重点倡导的一种发展模式。”“飞地经济”在上海起步较早，近年来上海通过联合建园推动产业转移的实践已有不少。其中，仅江苏南通就有上海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上海外高桥集团（启东）产业园、上海杨浦（海安）产业园等7家共建园区。《规划纲要》还提出打造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目前的状况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以及长三角城市群存在不小的差距，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也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同质化不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严重的问题，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关联一直比较少，各自为政的格局比较突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没有有效地形成一个产业上中下游紧密的链（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没有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参与渗透、相互搀扶的利益共同体。（大河网 2016年9月20日）

力推“立体交通体系”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长江水脉畅通，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统筹铁路、公路、航空、管道建设，率先建成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支撑力。

黄金水道功能的发挥，除了自身不断地完善之外，还一定要有陆路集疏运体系的配套。没有配套，黄金水道的功能和效益不能得到最优发挥。未来长江在运输方式上将力推“立体交通体系”，统筹铁路、公路、航空、管道、水路五种运输方式，充分

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解决联运问题，实现综合集成的最大化、最优化。

“长江经济带由于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这就决定了其交通基础设施必须在不同次区域内扬长避短、合理分工。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挖掘长江黄金水道的潜能，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其他运输方式的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大城市轨道交通等，一个也不能少。而且要特别关注各种运输方式的无缝对接。”（环球网 2016年9月20日）

进一步激发城市经济发展活力 江西省社科院党组书记、研究员**姜玮**：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将进一步激发。一是未来城市人口大规模聚集，进一步夯实城市群城市经济发展氛围。“长江中游地区人口流动将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南昌、武汉、长沙、九江、岳阳等城市群节点中心城市的人口汇集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二是新业态新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催生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当前，长江中游地区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异军突起，网购、快递、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在线教育等新业态已经快速进入百姓生活，这些新业态新产业绝大部分行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得到激发。”不过，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亟需加大突破行政区划的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只有体制机制获得突破，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光明网 2016年9月14日）

流域全开放成为区域协调的新变化 江苏省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后**陈柳**：本次规划涉及到整个长江流域，而过往的规划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因此，过去的发展导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区域发展各有特色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所以协调问题也变得更为重要。也因此，要从长江上、中、下游协调，以及长江辐射带的广泛区域来看协调问题。从我们的了解看，包括长江上游的成渝城市群，以及辐射到的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都在规划中有所涉及，也就意味着区域协调的新变化还表现在开放上，过去强调沿海地区，现在通过长江经济带战略的纽带包含了内陆地区的开放。其次，在城乡统筹方面，过去主要将提高城乡规划水平、统筹城乡基础设施，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现在专门把人的城镇化以及对应的制度安排，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从这个角度出发，新一轮规划也突出了发展中的质量和效益，而不是过去的规模，比如更加强调和细化了战略新兴产业和重点科技方向。（《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9月13日）

破除各地“免费搭车”的思维，鼓励产业对接 江苏省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骆祖春**：长江经济带涉及地区从产业结构看，其同构化现象比较严重。如汽车产业，长江

下游的上海、中游的武汉、上游的重庆等均作为重点发展产业。而同在长三角的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就有11个。在上海、浙江和江苏三地，比重最大的12个制造业部门中，有8个相同。更进一步，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产业趋同化现象也很突出，支柱产业基本上都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烟草加工业、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等产业上。产业同构化是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的源头。在这样的情况下，则很难形成对长江流域生态资源整体协调利用，因此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宏观总体协调规划，研究制定细化完善的配套措施。

从现实看，鼓励实现产业对接的税收政策较为可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可积极推行劳动力社会保险等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其次，可借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将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等人力资源成本涉及的企业所得税前提扣除比例扩大到工资总额的8%-12%，可以更好地提升劳动力素质，推动产业更好对接。再次，要推行利于产业链优化的投资重组税收政策，适度放宽特殊性重组条件，将原限于国企集团内部重组的免税划拨规定适用到所有性质的企业等，这将进一步降低税收对企业正常并购重组活动的干扰，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之间横向、纵向与混合的产业链重整活动。

鉴于《规划纲要》提出的鼓励创新驱动，应该将部分现代服务业纳入高新技术产业范畴，鼓励金融、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并以此放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如，在享受税收优惠时，改善认定条件一样，采用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占比作为审核依据。同时，积极鼓励扶持中小型企业创新发展，可引进类似英国的“现金返还制度”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相互补充，避免中小高新企业因研发投入导致亏损等。（《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9月13日）

信息快递

中国国企改革举步维艰 法国《欧洲时报》9月3日报道，中国政府近日批准了国企领域迄今最大的并购案之一，行业领先的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将吞并竞争对手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费加罗报》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披露，合并重组后的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将超过664亿欧元，这一合并行动是自实施水泥、钢铁和煤炭产业大型国企重组一年来最新的合并行动，旨在减少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建设能够打进国际市场、具备高生产力的企业。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了国资国企改革蓝图，国企改革的决定宣布时获得经济学家与市场大力好评，但三年来进展缓慢。在制定的2016年前实现的九个目标中，仅有通过合并与收购减少国有企业数量这项目标略有成效，而原本作为改革亮点

的私有资本投入大型国企的成果则微乎其微。改革目标与实际进展相去甚远。中国政府必须首先考虑创造岗位、最低增长目标等因素。总而言之，改革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费加罗报》总结认为，国企改革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而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于，在关闭老国企、支持市场经济的同时又要继续保留既得的社会福利，保持社会稳定。

鄂渝首次联合开展长江水质监测 《香港商报》9月14日报道，近日，湖北省巴东县和重庆巫山县两地环境监测技术人员，首次联合对长江干流鄂渝跨界断面(巫峡口)水质进行了采样监测。为推动长江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改善长江三峡库区水体质量，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健康发展，湖北巴东县环境监测站与重庆市巫山县环境监测站，当日共同对长江干流鄂渝跨界地区进行了现场踏勘，并对当地历史水文水质数据进行了分析评价，确定巫峡口为长江干流鄂渝跨界水质断面，并在此联合开展水质采样监测，评价长江干流鄂渝跨界断面水质。监测数据显示，长江干流鄂渝跨界断面水质良好，符合其承担的水质使用功能要求。

中国将加大个人隐私数据保护力度 香港《大公报》9月15日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以深化政府自身改革更大程度利企便民，加大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重要数据保护力度；并决定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会议指出，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关键之举。一要优化再造服务流程，加快政务服务事项电子化和网络化，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二要优化再造服务平台，推进实体政务大厅与网上服务平台融合，推动服务事项跨地区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跨部门协同办理。三要打通数据壁垒，促进各部门、各层级、各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力争到2017年底前，各省级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建成面向公众、开放共享的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2020年底前，建成覆盖全国、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四要加强系统和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加大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重要数据保护力度。五要加快清理不适应“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各种规定，统一身份认证体系等。

8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减幅扩大 日本 日经中文网9月8日报道，中国央行9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底的外汇储备为3万1851亿美元，环比减少158亿美元，连续2个月出现减少，减幅扩大至7月的约4倍。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降至2011年12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去年8月央行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后实施的大规模汇率干预举措的影响

显现。8月在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元等货币兑美元汇率下降的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没有变化。其原因可能是央行持续实施买入人民币的汇率干预举措。但是，为推高人民币汇率的大规模而买入人民币、卖出美元的干预举措被认为出现减少。但外汇储备的减幅仍大幅扩大，其原因被认为是2015年8月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影响。央行在下调中间价后为防止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实施了大规模的买入人民币、卖出美元的汇率干预举措。被认为当时除了现货交易外，还活用了为期1年的期货交易。

中国房价涨幅趋缓 经济增长压力加大 法国《欧洲时报》9月3日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了7月份主要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51个，比6月减少4个，环比涨幅总体收窄。而收窄幅度较大的城市主要是前期上涨过快的一线城市和少数热点二线城市。7月中国主要城市房价涨幅呈放缓趋势，可能会降低房地产泡沫的风险，但也意味着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行业建筑业在失去动力。

今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受到经济振兴和降息政策的推动，因此房价上升。同时2015年夏季股市危机也促使投资者转向房地产。但是一些观察者担心第一季度房地产已达到顶峰，尤其是众多城市为了防止未来房价突涨，已经对房地产交易实行控制。中国官方媒体的文章和社论均认为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央行7月21日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指出，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贷款增长加快，其中个人购房贷款增长突出。截至2016年6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23.94万亿元，同比增长24%。

粤港签首个“一带一路”协议 香港《大公报》9月15日报道，粤港两地政府在广州签署首个关于“一带一路”的合作意见书，未来双方将携手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和广东制造业发达的优势，鼓励、支持和引导粤港两地企业联合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发展，增强粤港合作抢占国际市场的实力，共同培育粤港合作新优势。未来粤港双方将在四个方面加强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包括深化国际贸易服务合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广东作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相互间的优势互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对接，扩大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深化投资、金融服务合作；加强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合作；深化航运服务合作等。

中国“天网行动”已追回1915人，追赃74.7亿元 美国侨报网9月6日报道，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成功召开。会议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很

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反腐败的。据今年 G20 反腐败工作组共同主席、中央纪委监察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介绍，2014 年以来，中国先后开展“天网 2014”、“天网 2015”行动，已从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1915 人，追赃金额 74.7 亿元；2015 年 4 月集中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已有三分之一(33 人)落网。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救经济须扩大需求及供给面改革并进 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8月20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从原来的两位数下滑到今年上半年的6.7%。目前中国经济总量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不合理并存，要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来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林毅夫认为，不能简单用西方国家的理论来套中国当前的问题，中国过去采取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把短期需求和长期共计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现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而是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来进行。未来美欧发达国家可能回因为未能真正进行结构性改革而陷入像日本那样长达10年、20年的增长疲软，这种外部性、周期性的影响有可能长期存在，因此可以将适度扩大总需求和供给层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相辅相成。

民法典拟于2020年编撰完成 香港《大公报》8月25日报道，第十一届中国法学家论坛24日在北京举办，参会专家以“民法典编撰：理论、制度与实践”为主题，深入探讨民法典编撰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指出，编纂民法典是法制建设的标志性事件，当前中国已经具备制定民法典的主客观条件，民法典编撰须结合中国国情，同时还要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民法典拟于2020年编撰完成，专家呼吁民法典编撰应反映时代特征。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和世界水准的民法典。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指出，中国当前网络侵害主要是对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的侵害，对个人隐私的威胁，民法典要全面地保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的尊严，才能彰显时代特征。

中国防洪的得与失 台湾《新华澳报》8月16日报道，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受不同程度洪涝灾害的威胁。其中，七大江河中下游和沿海平原占国土面积的8%，约80万平方公里，这里土地肥沃、雨热同期、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目前集中了全国二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耕地和四分之三GDP，是我国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精华之

地，同时也是受洪水威胁较为严重的地区。目前中国的防洪工程体系依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要解决城市内涝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入手，需要科学编制规划，增强规划的约束力；落实主体责任，加快工程达标建设；加强监测预警，做好应急超前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减轻内涝灾害损失；加强运行管理，确保排涝设施功能；强化科普宣传，提高防灾减灾意识。

农业二次绿色革命迎庞大需求 香港《信报》8月24日报道，全球人口预计会由现时的73亿，到2050年增加至97亿。同时，受气候变化及城镇化影响，人均可耕作农地却会减少17%。要应付增加的需求，全球食物生产要在2015年至2050年间增加一倍，才可达供求平衡。在人均可耕农地减少的情况下，农作物生产力须通过创新科技提升，其中一项创新科技农业模式成为精准农业。精准农业以物联网形式连结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收集大数据，从而显著提升运作效率。此系统可应用在记录土壤中的温度及湿度，或安装在农业机械如拖拉机中的实时收集及传输数据，令农夫可更准确地把握农作物的健康程度及预防受天气影响的损害等，预计生产力可因而提升约15%。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何楚龙

地址：城站路 85 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